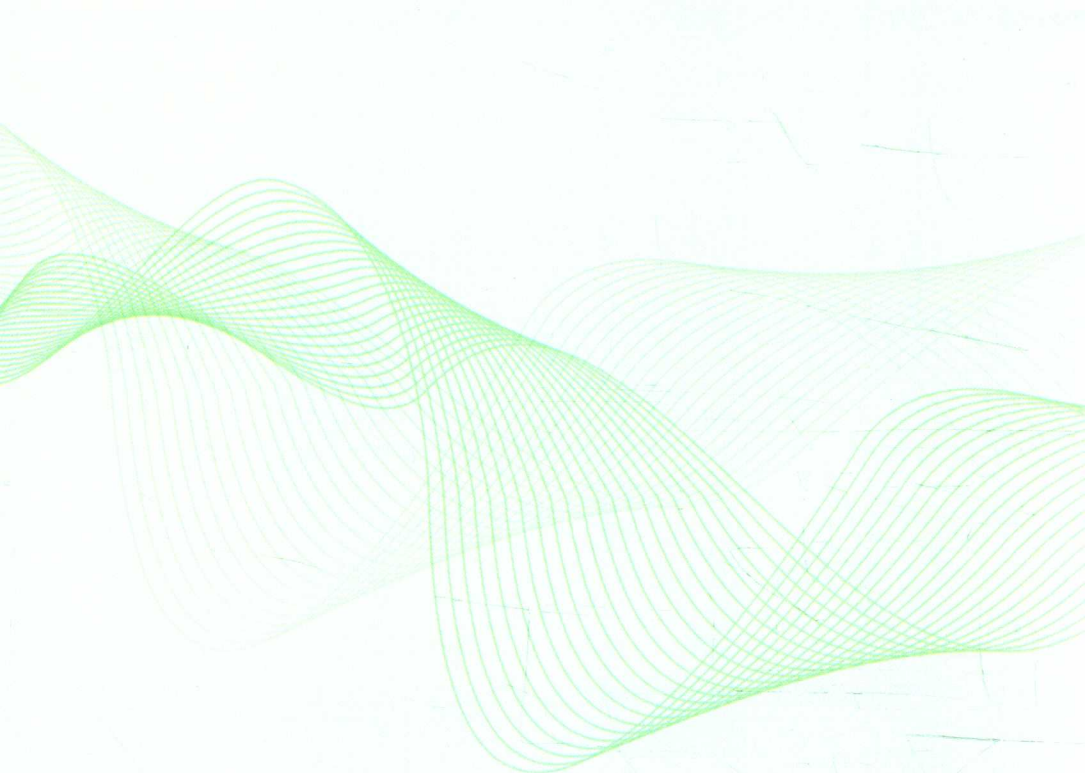




当代文化与文论视域中的 文学经典研究

舒开智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培育）——中国语言文学
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当代文化与文论视域中的 文学经典研究

舒开智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化与文论视域中的文学经典研究/舒开智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307-17209-8

I. 当… II. 舒…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1234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蒋培卓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166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7209-8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学经典的涵义、建构与阐释.....	5
第一节 文学经典的界定与品质特征.....	5
第二节 文学经典建构的动力及复杂因素	15
第三节 文学经典的阐释维度与空间	26
第二章 消费主义对文学经典的祛魅与解构	35
第一节 消费社会的来临与图像文化的兴起	36
第二节 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的冲击与解构	43
第三节 图像文化对文学经典的改变与重塑	51
第三章 文学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及其重构	62
第一节 文学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	63
第二节 文学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构	72
第三节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嬗变中的文学经典与 文学风格	86
第四章 当代文化与文论视域中的文学经典.....	101
第一节 互文性理论观照下的文学经典.....	104

目 录

第二节 误读理论与文学经典重读·····	113
第三节 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124
第五章 红色经典及其影视改编·····	141
第一节 红色经典及其概念之争·····	142
第二节 红色经典与文化领导权·····	161
第三节 红色经典改编中的焦点争议·····	173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201

引 言

文学经典已成为自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西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欧美文学界围绕文学经典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以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等为代表的新兴理论研究认为经典的遴选不单单是一个文学行为, 它关系到话语权力的争夺、民族文化和性别身份认同问题, 由此质疑经典的永恒价值, 主张拓宽经典。在中国, 随着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于 1993 年 9 月至 10 月间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的系列讲演,^① 1995 年 10 月, 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北京大学的讲演中谈到了读者与经典形成的关系、经典化的复杂性以及经典的积累等问题, 并介绍了“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的概念。西方的经典理论开始被引进来, 启发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和思路。同时, 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引发的激烈论争,^② 90 年代出现的给中国现当代作家重新排座

① 其讲稿 1996 年 6 月以同名著作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在本书看来, “重写文学史”的核心就是对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 “重写”的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被抬得很高的作家作品, 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 同样, 还要重新评价由于政治原因被边缘化或遭受冷遇的作家作品, 如沈从文、张爱玲等。1988 年, 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1988 年第 4 期上联袂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正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 拉开了“重写文学史”事件的序幕。

次引发的争议,^①中国学术界开始反思经典与权力、经典与意识形态、经典与政治等的关系,主张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文学作品入选文学史的标准。

21世纪以来,消费主义文化思潮席卷全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百姓的文化行为和日常生活。消费社会的文化生产中出现了大量挪用、戏仿和改写经典的现象,消费文化思潮已改变了经典的生产和接受格局,使人们不再迷恋于经典的深度阐释,经典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表象游戏,对经典的虔诚阅读已变为快餐化、平面化、时尚化、娱乐性的消费。人们在紧张的劳作和身心疲惫之余,不再依靠书香来陶冶性情,而是把目光投向电影院、购物中心、电视机、酒吧和咖啡厅。传统的经典开始失去它的某些功能,人们不再需要它来维护社会的文化秩序和指导今天的文化生产。电子媒介技术的进步满足了人们的娱乐热情并使这种热情得以释放,大量经典被改编成影视剧,戏说、调侃之风盛行。在图像文化符号的狂轰滥炸下,大众在感官愉悦的陶醉中变得单调平庸,放弃了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曾经作为历史记忆的红色经典也借助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现代传媒技术迅速走红,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在主旋律话语和市场经济逻辑的双重推动下,呈现出斑驳陆离的独特审美结构。红色经典的改编颇具争议,现代大众文化消费追求刺激与惊奇,红色经典文本的叙事资源又具有革命正统性和严肃性,革命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话语二者既有可以互相利用的一面,又具有某种龃龉与差异。如何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发掘红色经典的历史恒定性和伦理普遍性,成为经典研究中绕不过的话题,也体现了如何认识文学经典在大众文化转型中的核心价值和历

^① 1994年北京师大教授王一川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家重新排座次并引发了热议;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8卷)和谢冕与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10卷),都认为文学经典是人为建构的产物,不存在永恒的经典。

史意义。

当前,文学经典阅读现状堪忧,据《湖北日报》报道,自2012年12月8日开放至2013年10月,从湖北省图书馆新馆文献借阅排行榜上看到,进入前10位的有《十三步》《读者》《黑暗王子格雷亚3》《图解周易大全》《植物大战僵尸10》《高手过招》《赛尔号雷伊传说3 陨石大作战》《魔法老师》《女王·再见黑天鹅》等,没有一部经典名著上榜。以“黑暗”“僵尸”“魔法”“过招”等冠名的书籍达6部。虽然作家莫言被排在第一名,但他的上榜书籍是并不具代表性的小说《十三步》。^①同样在2013年6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搞了个“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网络调查,在统计了数千名网友的意见之后,结果却是:《红楼梦》高居榜首。榜单前10名中,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无一漏网,而《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瓦尔登湖》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也跻身其中。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方某重点高校图书馆,借阅量最大的百本图书中,一些“快速阅读类”的流行网络小说占据了近3成的比例,甚至在前20位中占据多数,这些网络小说也许满足了学生们“快餐式”的阅读需求,但真正给大家提供的“营养”却不够。^②

正如有识之士担心:现在不少人的阅读陷入娱乐化和功利化的肤浅境地,其目的不是追求美感和深度沉思,而是把阅读当作一种消遣和猎奇,顺从情性,排斥深度,拒绝理性思考,将阅读变成一种轻松闲适的活动。这种浅阅读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视觉化为特征。当下以玄幻、仙侠、穿越、官场等为主题的网络小说受到一些读者欢迎,微信、微博的片段式文字也让不少青少年习惯了“短、平、快”的阅读方式,这就是浅阅读的显著表征。浅阅读虽然满足了人们

^① 《湖北日报》2013年10月18日。

^② 《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23日。

快速便捷获取信息的需要，但是不利于阅读质量的提高，不利于读者思维能力、评判能力和思考能力的提高。对文学经典来说，浅阅读无法建构读者的主体性，无法直指文本中的心灵世界和理性高度。

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语境，作为传统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载体的文学经典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昔日给人类以精神支撑和心灵皈依的经典开始土崩瓦解。那么该如何认识文学经典的品质特性？如何正确看待经典的建构、阅读和阐释？如何看待红色经典的改编？如何认识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语境中重构经典呢？这应该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可以说，我们当下是一个亟需经典但又缺乏经典深读的时代。与其执拗于“本质论”抑或“建构论”之争，不如静下心来，仔细认真安静地阅读经典文本，回到文本自身。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告诉我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现实是多样的、多刺的，而且层层相叠，就像朝鲜蓟。对我们而言，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是可以不断将它剥开，像是一颗永远剥不完的朝鲜蓟，在阅读当中发现愈来愈多新层面。”^①因此，面对经典，我们要心存敬畏，耐心品读。哈罗德·布鲁姆也指出：“经典的陌生性并不依赖大胆创新带来的冲击而存在，但是，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②汲取经典中的哲思、精髓和智慧，这或许是身处现代性、后现代性交错复杂语境中的人们得以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不二选择。

①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29页。

②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第一章 文学经典的涵义、建构与阐释

第一节 文学经典的界定与品质特征

探讨文学经典的释义，首先得从“经典”这个词的渊源开始。在中国，“经典”起初是两个词。“经”，现存甲骨文无记载，据考证，始见于周代。《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进一步解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引申为可充当典范、法则的重要书籍。《后汉书·蔡邕传》：“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经”在战国后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经典”的意义。《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东汉的《白虎通义》释“经”为“常”，认为儒家经典含有超越时间的“常道”。《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里不仅突出了经典的典范性，指出了经典是“恒久”“不刊”的，也表明经典能经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今天，《现代汉语词典》对经典的解释是“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解释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

在西方，从词源学意义上来说“经典”(canon)一词，最初来自希腊文 kanon，指用于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不断延

伸，用来表示“尺度”“规范”“规则”，并且这些引申义作为本义流传下来^①。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并产生了新的含义。首先它代表选取经书文本和作者的原则；其次经典还指教会的文件、律法和教令。公元4世纪，经典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法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②在历史上后来不断有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过探讨。佛克马就认为：“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③经典这个概念自身具有历史性和具体性，如艾略

①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文化中，还有一个词“classic”也对应着“经典”的意思，但是与“canon”又有着区别。根据有关学者研究，classic的涵义经历了“等级”“标准典范”“古典”这样一个历时性的延展、引申、演变过程。从词源学上来说，classic最初源自拉丁词 classicus，这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分税收等级的专用语词；其后它又被引申、借用来说作家的等级；在文艺复兴时期，classic起初主要用于描述、品评作家，并逐渐具有了 classic 的现当代意义（即“经典”的涵义），如“最优秀的、第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作品）具有公认而无可争议之价值或地位的”（of the highest quality; having a value or position recognized and unquestioned）、“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等；再后来，它又获得了“古典（的）”“古典作家”的衍生意义，特指“古代希腊及罗马文学、艺术和文化之标准的”（of the standard of ancient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art and culture）、“古希腊或古罗马的作家”（ancient Greek or Latin writer）。因此，classic 主要指（像古典作家或作品——即古希腊、古罗马作家或作品——那样）取得了杰出而卓越的文学成就，并在各主要文类上树立了持久的文学典范和标准，且获得了广泛认可的作家或作品。因此，综合比较，classic 强调等级性、典范性和古典性，而 canon 则着重尺度性（准则、标准）、规则性、律条性、真伪性及协商性（世俗经典）等；另外，canon 还具有宗教性——canon 一词的词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印记，充分体现出宗教的神圣性、认证的（宗教）组织机构性、制度性、法规性以及（宗教）权力的干预与决策性等。参见曾宏伟：《在 Canon 与 Classic 之间：哈罗德·布鲁姆经典观特征管窥》，《广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李亚平在《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理论》一书中也从英语词源学角度考察，区分出来自于英文 classic 的文学经典 I 和来自于英文 canon 的文学经典 II。参见李玉平《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经典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② 刘意青：《经典》，《外国文学》2004 年第 2 期。

③ [荷]佛克马、蚁布斯著，俞国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 页。

特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什么是经典作品》，他认为经典的主要标准就是：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①博尔赫斯则认为，“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②马修·阿诺德在《诗的研究》中认为，经典的真正和确切的含义是指最优秀的作品。布鲁姆认为，“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他进而指出，“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③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于是，一项鉴别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

在当代中国，关于对经典的释义和理解，黄曼君先生在《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一文中，从思、诗、史三个方面作了界定：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④陶东风则认为：“无论在汉语还是在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规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或明或隐的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道德与政

① 转引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 页。

② 博尔赫斯著，王永年等译：《论古典》，《博尔赫斯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年版，第 7 页。

③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 页。

④ 黄曼君：《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文学评论》2004 年第 4 期。

治力量。”^①以上两种释义和理解各有偏重，前者主要从美学属性角度出发强调经典的普遍性，后者主要强调了经典的建构性特性。虽然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令所有人都完全满意的关于“经典”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对经典的基本品质特征予以归纳描述。本书认为，经典具有三种主要的品质特征：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独创性与典范性的统一。

第一，时代性与超越性的统一。一个具体的经典文本，总是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打上作者所处时代的烙印。经典常常饱含着一个时代的特殊的心理和情绪，成为时代的脉搏和回声。如黄乔生在《论鲁迅的经典性》中指出：“一个作家的经典性表现之一就是，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和集大成者。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②一些经典作家总是以自己的个人风格代表了时代的文学精神。如盛唐诗歌中所蕴涵的热烈奔放、气宇昂扬的恢宏气象，无论是边塞诗的高蹈壮丽、积极进取，还是田园诗的空灵隽永、柔婉清秀；无论是杜甫的沉郁顿挫，还是李白的瑰丽飘逸等，都能体现时代文化精神和特质对文学经典的内在影响。作家作为某一时代的成员，他的思想感情要受社会和时代的影响，作家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人，经典总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丹纳就曾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但是透过丰富杂陈的感性生活表象，作家又能达到对世界与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这种感性思考的普遍性与深刻性使经典具有形而上的真理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诗道出了有普遍性的事物。如但丁《神曲》对人类生存境况的象征性描绘、《红楼梦》对人的命运和存在境遇的

①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9 页。

② 黄乔生：《论鲁迅的经典性》，《鲁迅研究月刊》2004 年第 12 期。

文化性解析和思考、《阿Q正传》对“国民性”主题的针砭和剖析，诸如此类都是极富哲学意味的形而上的探求。从歌德、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列夫·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人类命运的苦苦探索和对自由的不懈追求。

但是，学者对经典所具有的超越性内涵又有不同的理解。黄曼君认为“它（指文学经典——引者注）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① 强调经典是时代性与开放性、超越性的统一。也有学者认为经典的主要特性就是超越性，陈思和就把经典当作超越阶级与政治的普遍人类文化成就，他甚至认为经典没有时代性：“我们真正判断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并不看它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流行歌曲、通俗文学往往是产生很大影响，是不是这样的作品都应该进入文学史？当然不是。这些东西都存在于一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当中，过了这个时代也就被人遗忘了，不可能一代代地吸引读者。”^②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经典意味着典范，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规范。经典化一方面要体现出某种超越性，另一方面又总是离不开具体的时代标准。经典之作一定会包含一种可以超越它的具体时代背景而覆盖到后代的超越性，也一定会有超越它的具体描写内容和表现手法的可以涵盖到更广阔社会生活的普遍意义。经典的认定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众多的文学接受者的阐释和重释活动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历史的具体的东西将不断被悬置、转换或遗忘。相反，那些普遍的永恒的东西将逐渐被凸现流传下来。经典作品丰富的包容性，往往能超越

① 黄曼君：《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②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的提法》，《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时空，不因时过境迁而丧失其价值。由于蕴涵着预言性或前瞻性，故在某种程度上经典作品往往成为思想的先锋。经典作品总是既蕴藏着经典作家独特的思想与感情，同时又包含了人类的共通意识——经典不因时代的冲刷而“褪色”，它能历久弥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如针对一些批评者以产生的时间太短为由对红色经典进行质疑，认为红色经典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烙印，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意志的话语色彩，就有学者指出：“红色经典”强烈地表达出为实现自身解放的劳苦大众对理想的憧憬和为之奋斗的热情，塑造了一系列为争取解放和幸福生活而英勇斗争的革命儿女和劳苦大众，在革命战争年代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建设的初期，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依然坚守理想和信念，既有精英式的悲剧反抗，更有忍辱负重的坚毅担当，体现了人类对有关责任、牺牲精神、舍小顾大等优秀品质的共同追求。它所洋溢的对信念的坚守，以及英雄气概、革命乐观主义、勇于献身、集体主义意识和精神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崇高精神品质的升华。^①

第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文学经典的巨大魅力就在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结合，经典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经典往往成为一个民族独有的心理体验、价值规范和审美观念的结晶，它能通过审美把握，细致地表现本民族的性格和感情，成为一个民族认识自己心路历程的镜子。经典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民族品格，经典总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经典能展现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理想，反映一个民族最深层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规范，凝聚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人格理想、信仰追求和宗教习俗，是该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核心体现，成为一个民族文化识别的标志。如中西方文学经典在人物描写、情节冲突、命运突转、婚恋离聚等方面形成的差别就是受到各自民族文化中

^① 焦垣生、胡友笋：《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的悲剧意识和审美心理的制约。但经典又表现出一定的开放和交流的品格，它总是以自身的包容精神和表达方式、审美品位自觉地充当沟通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桥梁。例如，红色经典中那种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对革命成功的信仰、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以及面对困难和考验表现出来的临危不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体现了人类面对苦难时的共同的精神品格和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

方忠在《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中指出：“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重要的艺术财富，它艺术地反映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上，生产出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能称得上文学经典的不会很多，而正是这些文学经典构成了民族的一个艺术原型和精神家园，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①如“红色经典”尽管创作题材和方法各异，但是共同的特征就是具有厚重的现代民族史诗品格，对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想象的建构，对民族历史变革和革命进程的热情歌颂和忠实记录，在共和国文学史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认为：“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语与俄罗斯文学，鲁迅之于中国与中国新文学，他们的经典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富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鲁迅被称为‘民族魂’。”^②经典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但是，另一方面，经典又具有时空上的延展性，能亘古常新，在其他民族的文化空间中获得言说的契机。诚如黄乔生在《论鲁迅的经典性》中所言：“作为经典的鲁迅并不意味着成为历史，他与

① 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②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现实有对话的能力，他不但在中国读者中仍有号召力，而且在世界文化中也有认识价值。他的革命精神，他的思想家的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性，还在亚洲一些国家产生了影响，例如韩国的思想界，就不乏民主革命的领袖把他当作精神的导师。”^①

经典中包蕴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因子，但是经典又具备超越民族性的普遍意义。缺少了世界性内蕴的作品，就会导致狭隘的民族意识。李建军在批评《白鹿原》时就指出其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伟大的文学可以表现民族情感，但不能狭隘，而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在这一点上，《白鹿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② 林凌在《二十世纪抗战文学为什么没有经典作品》中也指出：“中国抗战文学至今没有创作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战争文学经典。”^③个中原因耐人寻味。我们认为，当时的抗战文学主要是在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渗透和主导下写成的，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人道，忽视对战争中的人的感性命运的揭示，在血与火的壮丽描写中放弃了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思索，在冲锋陷阵的枪林弹雨中看不到个人牺牲的悲苦和家庭破碎的心酸。殊不知，经典在本质上具有普遍的文化意识与文化品格，它超越民族性的界限，能反映人类共同的需求与理想。人类文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有生命力、有创造性的文学经典，总是通过对人的生存，通过对民族命运的揭示来反映人类和世界共同的处境。一个民族的文学经典以自身的独创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并以自身的民族性对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而且，就中国文学经典来说，强调文学经典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有利于纠正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的“影响/接受”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简单地认为世

① 黄乔生：《论鲁迅的经典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② 李建军：《直谏陕西作家》，《文艺争鸣》2000年第6期。

③ 林凌：《二十世纪抗战文学为什么没有经典作品》，《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